



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

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 上册

Deriv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Document
Centred around Circulation and Block Printing in Late Antiquity
VOLUME I

顾永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

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 上册

Deriv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Document
Centred around Circulation and Block Printing in Late Antiquity
VOLUME I

顾永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全2册/顾永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301-24178-3

I. ①经… II. ①顾… III. ①经学—文献学—研究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1340号

书 名: 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上下册)

著作责任者: 顾永新 著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178-3/G · 381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374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54.25印张 889千字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35.00元(全2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题 辞

文献是经学的本原，通变为经学之关键。这一论著，于近古经学文献的衍变，致力尤深。著者爰据版本，斟酌于正变之间；因依校讎，槩括于雅俗之际。覃精研思，用力至勤。论近古经学，可谓深切著明，曲尽幽微。此书当成传世据论之力著，顾氏或为当代经学研究之大家，岁月将证明此言为不虚美矣。

安平秋

2014.8.

序

孙钦善

中国经学文献的流传衍生,是一个广阔而深湛的研究课题,涉及古文学、学术史、乃至文化史多方面领域。宋元明清近古时代,经学文献的流传衍生,繁复多变,形式上又出现通俗化的趋向和特点。顾永新博士的新著《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堪称这方面开创性的研究力作。有机会先读到书稿,深感其中创意新见迭出。作者视野开阔,视角新颖,面对中国近古学术、文化发展的时代大背景,深入探讨经学文献的流传衍生的具体事实,细致剖析、比较有关文献版本的众多案例,宏观与微观研究紧密结合,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规律性结论,富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分别言之,本书主要成就有如下几点:第一,总体思路清晰,结论确切,谋篇布局,恰当合理。关于此,作者在《绪论》和全书《结语》中有明确论述,如《结语》说:“近古时代,经学文献在流传和刊行过程中,为满足民间广大受众的多元需求,不断地衍生出新的不同类型、不同级次的文献,并表现通俗化的倾向。本书立足于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大主干系统,兼及其他系统或载体,以及日本佚存经学文献回传的研究,通过对各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经学文献的传承、流变、编纂、刊行的考察,透视出近古经学文献衍生的大致脉络和一般规律,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通俗化倾向。”全书正是按着这样的思路和层次来论证和表述的。其中对“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个主干系统内涵和相互关系的分析概括,尤为恰当,作者认为:“‘十三经’的原典及其历代注释是经学文献的本原和核心,原典大体成于先秦、秦汉,接下来有汉、魏直至晋古注(《孝经》有唐玄宗御注),是对原典的注释;又有南北朝直至隋义疏和唐、宋‘五经正义’‘七经疏义’,是对原典及其特定古注的再注释。宋元刊行的诸经注疏合刻本,以及明清汇刻的‘十三经注疏’就是

这些经、注、疏(多附载《经典释文》)的结集,是为正经注疏。这是一个垂直的、自足的系统。随着汉唐章句注疏趋向繁琐化和自我封闭,肇端于唐代后期、宋代全面展开的摒弃章句注疏之学、倡导义理之学的经学思潮蔚然成风,于是‘五经四书’的新注不断涌现,尤以朱熹及其学派的相关著作影响最大,南宋后期至元代既成主流,进入明代更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朱学系统内部的传承和发扬又使之形成新的垂直系统,即朱子等注释原典,其弟子或后学为之再作注释,并将这个系统内外的各家说法加以汇编,这就是‘五经四书’系统。近古时代,其传播范围之广、通行程度之高,是正经注疏所无法比拟的”,“两大主干系统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正经注疏是‘五经四书’的知识源泉和理论基础,‘五经四书’是正经注疏的时代精华和自然延展。二者既有交集,相互交融,相对独立,各自为用”,此说甚有见地。作者以这两大主干系统来考察经学文献的流传衍生情况,可谓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层次分明。第二,关于经学文献的流传衍生情况的研究以扎实、丰富的文献版本个案研究为基础,而在从事个案研究时又始终坚持使用科学的版本研究方法,即将版本鉴定与版本源流考证密切结合,尤其注重版本源流考证的方法,清晰彰显出有关文献流传衍生的具体情况,十分难得。第三,由于思路明确、方法科学,所得结论多有创获,或开拓创新,发前人所未及;或解疑释惑,补前人之不足;或纠谬辨误,正前人之失。开拓创新者,如第一章第五节中,通过对三部平水刻本《尚书注疏》(铁琴铜剑楼旧藏本、内阁大库本、傅增湘旧藏本)所进行的文本校勘,并结合版式、行款的分析,明确厘清了三者的版本源流,进而辨析金刻本和蒙古刻本的承续关系。而此前学界对于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并无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又如同章同节下,对于注疏合刻时间问题的研究有新见:清人开始意识到注疏合刻的问题,但对于合刻的时间并无一致意见。现在一般认为始自南宋初八行本之刊行。作者通过对《论语注疏(解经)》和《尚书注疏》传世诸本异文的考察,揭示了《论语》注疏合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地域性和时代性,提出《论语》注疏合刻本先于八行本出现的可能性。又如第一章第七节,作者注意到宋元以降,坊刻经书往往于卷首或卷末附刻与该书内容相关的参考资料的现象(如《春秋》附刻《春秋名号归一图》《春秋〔二十国〕年表》《春秋图说》等),于是通过对传世宋、元、明各本的考察,辨析其附刻内容之有无、多寡或沿用、校订的状况,藉此梳理传刻源流和版本系统。又如诸经附入《释文》,是经学文献衍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情况

相当复杂。由于五代、北宋监本《经典释文》各经单行的出版模式,经注本经历了从附刻《释文》到附入《释文》的过程;南宋注疏合刻本出现之后,又有以《释文》附入者。在本书第一章第八节中,作者从与《释文》关系的视角来考察经书的传刻,集中考察宋元《论语》经注附《释文》本和附《释文》注疏合刻本,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通过各本异文的比勘,发现经注本和注疏合刻本所附《释文》并无承袭关系,而是分别源出《经典释文》。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对于宋代经书版本乃至古文献学史的研究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又如考辨《诗集传》音释本:为了适应一般读书人阅读以及学校教育、士子科举的需求,诸经的音释类著作在元明时期颇为流行,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书集传》《诗集传》音释本。《诗集传》音释本出现在元末,作者在第二章第三节中,按所附音释内容多寡分为简式和繁式二种类型,穷搜博探,广校众本,发现简式和繁式音释的主体内容都出自元许谦《诗集传名物钞》,但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承继或因袭关系,应是各自独立完成的音释本。又如广泛辑考“五经四书”系统各类通俗化经学文献:宋元之际,出于乡塾童蒙学习儒家经典尤其是士子科举考试的需要,通俗浅近的经义类、旁注(或作傍训)类、句解类经学文献大量涌现,这些都是“五经四书”通俗化的产物。作者在第二章第四、五、六节中,广泛搜罗历代书目著录及传世版本,探赜索隐,比较完整地辑辑各类代表著作,并揭示其主要特征及传刻源流。又如考察南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的衍生路径:明清直至近代通行的《左传》读本,并非《杜注》单行本或《胡传》单行本,而是附入林尧叟《句解》的《春秋胡氏传》本和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合编的杜林合注本。这一点往往为精英《春秋左传》学史所阙如。作者在第二章第五节中,详尽地考察了《春秋左传句解》传刻及其衍生的进程,揭示了它在《春秋》学史乃至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特异的学术意义和思想价值。又如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与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废序(《毛诗·小序》)”派相对立的“尊序派”的代表作,在《诗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颇大,南宋以降梓行不断,出现众多复杂的版本。作者在第三章第四节中,对《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各种版本做了穷尽式的考察,条分缕析,追根溯源,梳理出明晰而确切的版本源流系统,并绘出详明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宋刻本及明清重要版本源流示意图。解疑释惑者,如发现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亡佚的线索:杨守敬自日本携归的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后为刘世珩所得,但刘氏死后,其书遂下落不明,中日两国的各种记载多称不知所在。作者第一

章第五节中披露所发现的王国维 1918 年致罗振玉书,确认其书焚毁于浦口客栈。又如考证“五经论”作者:“五经论”究为苏轼、苏辙谁人所作,宋代伊始即启疑窦,南宋人已不得其详。作者在第三章第五节中,从后世别集、总集的收录情况、历代书目的著录情况以及文本内容等多方面考证,定为苏辙所作,持之有故。又如推定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作义要诀》的刊刻书坊及时间:北大藏《科场备用书义断法》六卷、《作义要诀》一卷,长期以来,仅著录为元刻本,具体刊刻书坊及时间不明。作者在第二章第四节中经与同为元代著名书坊刘叔简日新堂刊行的同类书籍《书义主意》和《诗义断法》比对、分析,推定北大藏本《作义要诀》当为日新堂至正八年前后所刊。纠谬辨误者,如考三朝版诸经:南宋监本书版入元转入西湖书院,迭次修补,明代移置南京国子监,重新整补、印行,故称“三朝版”。三朝版诸经,属于作者所分的正经注疏系统,版本极其复杂,包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合刻本等等。作者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根据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和明《南雍志·经籍考》的相关著录,在王国维相关研究(见《两浙古刊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等)的基础之上,根据版本类型逐一进行比对和认证,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对于王说正确部分充分肯定,予以吸收;对于王说失当之处,一一考辨,多有澄清。又如关于元贞本的版本源流的研究:作者在第一章第五节中,通过与传世诸本(蜀大字本、八行本、十行本)的比勘,纠正了杨守敬、缪荃孙直至傅增湘、王国维等的误说,指出元贞本并非直接出于单疏本,其祖本当即最早注疏合刻的宋本,如《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十卷本《论语注疏解经》之类的本子。至于元贞本与蜀大字本的关系,前者并不出自后者,进而否定了王国维关于蜀注疏与平水注疏关系的推断。又如对于“淳熙小字本”《春秋经传集解》版本系统及覆刻时间的认定:南宋淳熙三年阮仲猷种德堂刊本《春秋经传集解》后世翻刻(覆刻)本甚多,清人乃至今人的著录颇为参差,或以为宋刻原本,或以为明代覆刻本。作者在第一章第六节中,通过对传世诸本穷尽式的研究,钩校辨赝,从而指出真正的种德堂刻本已佚,今存各本均为明代覆刻本,又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成于嘉靖中,一在明中叶以前,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覆刻关系。又如对《四书章图纂释》和《四书辑释》的研究:元代最为通行的两部《四书》学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和倪士毅《四书辑释》,原本各自单行,明初合编,并不断衍生出新的版本。作者在第二章第七、八节中通过穷尽式的搜讨,探寻其衍生路径,辨正《四库提要》及王重民、海内外各图书馆的错误著录,进而揭示“四书”类经

学文献走向民间、渐趋通俗化的进程。如此等等,可谓美不胜收。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作者除了娴熟地使用传统的版本考察方法取得优异成果之外,还善于运用各种新的视角考察有关问题,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如有关北宋国子监校定群经的记载纷繁复杂,说法亦不无参差。作者在第一章第二节中,根据对参与校刊人员、所校刊之版本类型及时间先后的考证,并结合传世版本及相关文献记载,划分校刊批次来进行研讨,提纲挈领,眉目清晰,厘清了复杂的问题。又如作者在第三章第一节中,从坊刻与学术互动关系研究元代坊刻本的策划、编校和刊行,视角新颖,又有见地,取得重要成果,所归纳的结论十分精彩和切当:“以理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和以书坊为主体的商业出版两相互动,在文化传播这一大舞台上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文化思潮的走向影响甚至左右着商业出版的取向和进度,而雕版印刷的最终商品——书籍又为学术进步和文化遗产推波助澜”,“建阳书坊多世代经营的刻书世家,……他们往往是学者或藏书家与书坊主集于一身,既亲自编写或组织文人编纂图书,又直接从事图书出版、流通,具有文人、商人二位一体的特殊身份。书坊主多与文人学士有着密切交往,能够及时了解读者群体的普遍需求,捕捉学术研究动态,探明学术著作的分布。如有佳作,他们就会收购书稿,或联系作者,不失时机地尽快出版。有时,还会主动地去组织稿源,根据选题邀请文人写作,以使书坊出版的书籍具有延续性和时效性,当然也有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的初衷。书坊把图书编纂、刻印、销售集于一体,掌握了图书产销的整个过程,其中也包括与刻书所需原料产地的联系和图书流通环节的渠道,成为一个文化与商业有机结合的出版机构。……加之这种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之有利于及时推出新的学术著作,刊印快,行销广,市场占有率扩大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受众面及其在学界影响的扩大。同时,书坊也考虑到大多数读者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书籍编纂体例和版式行款上下工夫,或以‘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等形式编书,方便读者诵读和查阅;或使用黑口与书耳,眉目清晰,易于翻检。书坊在学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守要的桥梁,对于满足图书市场需求、弘扬学术、传承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又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九节中,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辨析《孟子音义》和《正义》的真伪:《孟子音义》和《正义》的真伪及其相互关系是宋元以降《孟子》学史乃至经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前人论述多集中在对朱熹、钱大昕等人相关言论的评判和考辨,所举论据亦不出其樊篱。作者站在学术史的角度来考察,

探赜索隐,追本溯源,还原宋至清围绕着《孟子音义》《正义》真伪问题而展开的探索的脉络和流变;而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如本节结语所云:“是通过对宋本赵注、《音义》的传抄、校勘、覆刻(或翻刻)来完成的,中间还穿插着清代《孟子》学史上的两个核心问题——《章指》和《音义》。通过《章指》的辑录、复原,可见伪孙疏删除《章指》,改造之后列于疏首的伪迹;通过《音义》的传抄、校刻,可见伪孙疏据《音义序》改造而成的《正义序》之伪,进而判定全书之伪”。同时,作者还注意到,清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是与其对宋元旧本的访求、影写、传抄和校勘、刊刻同步进行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可见版本传刻、校勘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如此等等,足以显示视角的新颖和结论的精湛。

涉及版本研究必须亲自目验并深入考察,为此作者不辞辛劳,争取到不少难得机缘,亲访北京、上海、昆明、台北乃至日本、美国等有关藏书机构,研览所及的重要典籍多达一百四十余种,其中包括一书的不同版本,特别是众多希珍版本。多年以来,作者相对集中于古籍版本研究,参与北大古文献研究中心的多个重大项目,从事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及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七十部宋元版汉籍版本源流系统的考察研究,撰写学术前言或图录解题,对本课题的研究多有积累,从中获益匪浅。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多以单篇论文形式先后在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不仅使局部成果及时产生实际效用,而且使这些成果的原创价值一一得到切实验证,这也是非常可贵的。

回顾十年前我在为永新同志大著《欧阳修学术研究》写的小序中曾经提到他的治学优点“勤”和“敏”,还有“谦虚、扎实、力求创新的学风”。十多年来,永新同志继续坚持和发扬这些优点、优势,始终不渝刻苦实践,在学术上精益求精,以臻于佳胜之境,这部新著就是有力的见证,实在可喜可贺,并期望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收获。

值大著即将面世之际,承作者嘱序,写了如上读后感言,聊以当之。

二〇一四六月

目 录

上 册

绪 论	1
第一章 正经注疏的衍生和传刻	38
第一节 五代监本九经的校刻	38
第二节 北宋国子监校刻群经考	45
第三节 南宋国子监校刻群经考	68
第四节 宋代经书刊刻的地域研究	
——以蜀刻本为例	87
第五节 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	122
上、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缀合及相关问题	124
中、金刻本、蒙古刻本《尚书注疏》版本源流	152
下、注疏合刻时间问题的再认识	165
第六节 “淳熙小字本”《春秋经传集解》版本考	194
第七节 《春秋名号归一图》《春秋年表》传刻源流考略	219
第八节 宋元《论语》附《释文》本考	245
第九节 《孟子音义》《正义》辨	
——以学术史的考察为中心	270
第二章 “五经四书”的衍生和通俗化	314
第一节 《周易》传、义分合考	314
第二节 《书集传》音释本考	336
第三节 《诗集传》音释本考	354

2 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上册)

第四节 宋元经义类经学文献研究	376
上、宋元经义类经学文献考略	376
下、《作义要诀》文本研究	401
第五节 宋元句解类经学文献研究	413
上、宋元句解类经学文献考略	413
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传刻考论	438
第六节 元明旁注类经学文献考略	467
第七节 《四书章句纂释》编刻考述	487
第八节 《四书辑释》编刻考述	501
第九节 “四书五经大全”取材论略	
——以《春秋大全》为中心	529

下 册

第三章 其他系统或载体的经学文献	549
第一节 元代坊刻与学术的互动关系研究	
——以刘叔简日新堂为中心	549
第二节 《诗义》修撰及其解经体式考论	571
第三节 龚原、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名实考略	591
第四节 《吕氏家塾读诗记》版本考略	600
第五节 经学文献的散佚或缺或张冠李戴	625
上、二苏“五经论”归属考	625
下、苏辙佚文两篇疏证	639
第六节 经学文献的特殊载体——石经研究	650
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刊石、雕版考略	650
中、蜀石经续刻、补刻考	668
下、嘉祐石经丛考	687
第四章 日本佚存经学文献的回传	703
第一节 日本传本《古文孝经孔传》回传中国考	703
第二节 日本传本《孝经郑注》回传中国考	730
第三节 《孝经》开元始注与天宝重注比较研究	746
第四节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述	772

第五节 佚存经学文献举隅

——《周易本义附录集注》考略	788
----------------------	-----

结 语	798
-----------	-----

参考文献	802
------------	-----

主题词索引	817
-------------	-----

图版目次	832
------------	-----

后 记	845
-----------	-----

绪 论

在中国文化史上,近古(宋、元、明、清)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市井文化的漫延,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推广,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文学、学术、宗教、艺术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民间化、世俗化、多元化的倾向。而经学作为传统学术的核心和根基,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形式,其直接的载体——经学文献也是如此,在流传和刊行过程中,由官方走向民间,由单一走向多元,由高雅走向通俗,不断衍生出新的不同类型、不同级次的文献,数量更大,受众面更广,普及程度更高,商业运作更多;与之相适应,内容和形式不断地调试,以期满足多层次、多用途的受众需求。

经学文献是中国经学的知识载体和表现形式,可以按照类目(如《易》《书》等“十三经”及“四书”类、群经总义类、小学类等)、时代(上古、中古、近古)、传本类型(简牍、石经、写本或抄本、刻本、活字本等)、记录形式(文字、表格、图像等)等不同的分类标准做不同的区分。其主体是儒家经典的原典以及以之为核心的历代编纂、注释、校勘、考据等整理、研究成果。“十三经”的原典在先秦、秦汉时期俱已成书,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文本;汉、魏、晋直至唐人为之作注,是对原典的注释;南北朝义疏及唐、宋“五经正义”“七经疏义”,是对原典及其特定古注的再注释。宋元刊行的诸经注疏合刻本,以及明清汇刻的“十三经注疏”就是这些经、注、疏(多附载《经典释文》)的结集,我们姑且称之为正经注疏^①。这是一个垂直的、自足的系统,

① “正经正注”语出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为其书经部第一部类的类目名称。原注:“此为诵读定本,程试功令,说经根柢。注疏本与明监本五经,功令并重。”张氏所谓“正经正注”,兼指明清通行本“十三经注疏”和朱熹等宋元人新注“五经四书”,二者均为元、明、清科举程式所指定的。本书对“正经”的界定和使用有所不同。我们认为,狭义的“正经注疏”专指传统的“十三经注疏”经、注、疏,宋元以降“五经四书”及其相关著作并不在内。这是因为,在近古经学史上,朱学系统的“五经”新注和《四书章句集注》系列著作的通行程度、使用范围及其深远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传统“十三经注疏”的范畴,尽管其(转下页)

是整个经学文献的核心,其他系统的经学文献都是由此衍生、孳乳而来的。随着经学史上拨弃章句注疏之学、倡导义理之学的经学转型期的结束,“五经四书”的宋元人新注不断涌现,尤以朱熹(1130—1200)及其学派的相关著作影响最大,南宋后期至元代既成主流,进入明代成为独尊的通行本。近古时代,其传播范围之广、通行程度之高,是正经注疏所无法比拟的。朱学系统内部的传承和发扬又使之形成新的垂直系统,即朱子等对于原典的注释成为新的经典,其弟子或后学为之再作注释,或称注(传、释、解等),或称疏(疏义、纂疏等),并将这个系统内外的各家说法加以汇编。当然,两个系统之间既相对独立,各自为用,又有交集,相互交融,如元李廉《春秋诸传会通》就是由正经注疏系统《左传》注(杜预《集解》)、疏(孔颖达《正义》)和宋人“五经”系统胡安国《春秋传》两个源头衍生出来的。虽有所侧重,但更多地呈现出来的是二者的交集。本书立足于上述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通过对各系统内部经学文献的传承、流变、编纂、刊行的考察,透视出近古经学文献衍生的脉络和规律,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通俗化倾向。

这里,我们引进级次文献的概念,将两个系统内部的经学文献再作划分,依次分为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文献,以期对各系统内部经学文献有整体的、全方位的而又历史的、有层次的认识,并进而探求各级次文献之间衍生、孳乳的过程。

一、正经注疏的衍生和传刻

正经注疏系统的一次文献无疑就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等“十三经”的原典。一次文献本身既已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语言文字、思想文化、历史因革和学术传承信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抄写或印行更形成了不同版本,从而增加了其复杂性,削弱了其稳定性。这种版本异同的状况在二、三、四次文献中同样也是存在的。二次文献包括汉、魏、晋古注,间有隋、唐旧注,是对一次文献(原典)的注释,所谓“正注”包括《周易》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伪汉孔安国传,《毛诗》汉毛萸传、郑玄笺,《周礼》郑玄注,《仪礼》郑玄注,《礼记》郑玄注,《春秋左传》晋杜预集解,《春秋公羊传》汉何休解诂,《春秋穀梁传》晋范宁集解,《论语》魏何晏

(接上页)最初的源头依然是注疏,但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所以,我们所使用的“正经注疏”范畴只是借用了张之洞原概念外延的一部分。

集解,《孝经》唐玄宗注,《尔雅》晋郭璞注,《孟子》汉赵岐注等。当然,汉魏至隋唐的其他注解,如《周易》汉魏的孟喜、京房、荀爽、马融、郑玄、虞翻、王肃等注,《尚书》汉代的伏胜、马融、郑玄等注,汉代鲁、齐、韩今文三家《诗》传(或分内、外传)、说、故,《左传》汉代的贾逵、服虔等注,《论语》郑玄注,《孝经》所谓的“孔传”和“郑注”等等,理论上也属于二次文献,只是由于政治、学术或地域、学派等方面的缘故未能成为“正注”。经传(如《易经》和《易传》,《春秋经》和三传)原本各自单行,古注更是独立于经传之外别行。不过,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而无单经本^①。也就是说,六朝以后一、二次文献已合为一体,正经因正注而得以传承有绪,正注因正经而获得正统地位。三次文献即所谓疏,是对原典及原典注释的再注释,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次:一是南北朝直至隋代的义疏之作,今多已亡佚,传世者有梁皇侃《论语义疏》;二是前揭正经正注的“疏”,包括唐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和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②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以及宋邢昺等编纂的《论语》《孝经》《尔雅》三经新疏(唐人贾、徐、杨所撰四疏连同宋人新修三疏,北宋时由国子监校定刊行,称之为“七经疏义”)和旧题北宋孙奭所作《孟子疏》。实际上,唐宋人所作的疏(正义)是在前人义疏的基础上完成的(如邢昺《论语疏》“大抵翦皇氏(《义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③),基本上涵盖了其主体内容(个别的疏直接以前人旧疏为蓝本,如唐元行冲为玄宗《孝经注》作疏,而邢昺疏所依据的正是元疏)。疏(正义)原本单行(单疏本),直到南宋才出现注疏合刻本,经、注、疏合刻,至此一、二、三次文献合而为一。当然,这并不排除同时及其后并行的单经(白文)本、经注本、单疏本等其他类型正经刻本的存在。

从时代上划分,正经注疏的一次文献均产生于先秦、秦汉,二次文献主要是汉、魏、晋古注,及个别唐人旧注,三次文献则是南北朝直至唐宋由一、二次文献衍生出来的。二次、三次文献之外,唐宋以降正经的其他注释(之

①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影印本,2003年,第三册,第525页。

② 清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经部二十六《春秋》类一《春秋公羊传注疏》提要从北宋董道《广川藏书志》说,以为徐彦当在唐贞元、长庆以后(中华书局影印清浙江杭州刻本,1965年,第211页)。现在一般认为徐彦是北朝人。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经部三十五“四书”类一《论语正义》提要,第291页。